

文史知识

我的读书经历

杨宪益

《玉台新咏》三问

金克木

试论中国古代的隐士

刘叶秋

年号的起源与变迁

史苏苑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几位画家

卞孝萱

楚文化与楚国史研究概况

曲英杰

1986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78449

文史知识

1986年第2期

(总第56期)

• 治学之道·我的读书经历	杨宪益	3
• 文学史百题·《玉台新咏》三问	金克木	7
• 历史百题·试论中国古代的隐士	刘叶秋	16
• 怎样读·冯梦龙、凌濛初和“三言”“二拍”	魏同贤	23
• 词学名词解释(15)·填腔 填词	施蛰存	29
诗 文 欣 赏	漫话崔颢的《长干曲》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读李煜《相见欢》二首	赵其钧 32
	披肝沥胆的友谊之歌 ——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	史 玛 35
		黄天骥 39
• 文史书目答问·		
王维诗文最好的古注本——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陈铁民	44
文化 史 知识	中国古代的影戏	王锦光 洪震寰 48
	年号的起源与变迁	史苏苑 51
	漫话“沧桑”	陶世龙 58
• 文学人物画廊·		
清正的节操 不幸的命运——谈《桃花扇》中的李香君	侯光复	64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三十四)·		
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之二	朱瑞熙	68
人 物 春 秋	西汉牧羊商人卜式	梁仲明 73
	直如朱丝绳 清如玉壶冰——南朝著名诗人鲍照	王 毅 77
	“风格高秀”的词客姜夔	刘向阳 82

• 古典文学流派 • 浙西词派	程郁缀 87
-----------------	--------

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

——古典小说评点略述	孙 迅 90
------------	--------

成语	管中窥豹	达雪倩 96
典故	千万买邻	肖 学 97

熙宁变法的流弊	郑宜秀 100
---------	---------

- 文史信息 • 中国古代神话的两大系统(98) 中国古代的数学(98) 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99) 略论宋词的“复雅”(99)

读书	“挟天子”不能解释为“挟制天子”	王健秋 104
札记	析“万古云霄一羽毛”	曾怡亭 105

• 书画欣赏 • 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	蒋文光 107
----------------------	---------

青年园地	清新绮丽 自成一家 ——试论元人萨都刺边塞诗的民族色彩	曹新华 109
	清代乾隆时期的议罪银制度	林新奇 112

• 文史信箱 •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几位画家	卞孝萱 115
-------------------------	---------

• 文史古迹 • 逝者如斯——十三陵的水	牟小东 121
----------------------	---------

• 文史研究动态 • 楚文化与楚国史研究概况	曲英杰 123
------------------------	---------

补白10则	能人遇明主则显(6) 分贤佞须至明者(22) 廷彦作诗(28) 晏子论用人(38) 梅花逸事(43) 王翱伤妻不调婿(47) 汉语中的佛家语(72) 饥时易为食(81) 兄弟争雁(95) 赵广断指拒画(106)
-------	---

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封二) 宋振庭同志手迹(封三)



· 治学之道 ·

我的读书经历

杨 宪 益

杨宪益，1915年1月生，年轻时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编，现任该刊顾问。主要译著有《译余偶拾》、《英国近代诗钞》；荷马《奥德修记》、维吉尔《牧歌》；英译《鲁迅选集》（四卷）、《儒林外史》、《红楼梦》、《长生殿》、《关汉卿杂剧》、《老残游记》、《唐宋诗文选》等。

一些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朋友要我写写“治学”经验。谈起“治学”，实在不敢当之至。我虽也爱好文史，过去也写过一些零七八碎的笔记，但大都是一时兴起，随手捡来的东西，说不上治学。这里只能简单谈一谈过去读书经历过的道路，也许从中可以总结出几条个人经验和教训，不过对旁人不一定有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也不同。所以古人说“学我者病”。只要肯学，肯下功夫，每个人总是会摸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的。

我小时读书的条件很好，家里有不少先辈留下来的旧书，可以偷着自由翻看；这些各式各样的旧书，从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到明清近代的笔记小说，包括一些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梵天庐杂俎》等，还有整套的林译“说部丛书”，此外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当时老家在天津。每天傍晚还有小贩来喊卖“闲书”，可以叫到院子里来挑

选，也可以租看，看完了过几天再还给他，内容都是些《施公案》、《彭公案》之类。这些东西同今天流行的通俗武侠小说差不多，看多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也可以增长一点社会知识。

我没有上过小学。家里给我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是个秀才。相当于别家孩子上小学的年纪，我就在家里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书。初读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十岁以后读“四书”，然后是《诗经》、《书经》、《左传》。此外还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楚辞》，这些都是要背诵的。我小时记性不错，一般的书分段读个二三遍，就可以背下来了，所以并不感到吃力。老师只是把大意说一说，并不逐字逐句的教，所以有的书读完了，文字也并不完全懂，许多地方还是后来回忆起来，查了查书，才弄懂的。这种死背书的教学方法实在不足为训，只是小时背过的书，后来再回过头弄懂，至少不需要再翻找原文了。如果说这样有什么用处，其实不过如此。

上了中学以后，古文就放下来了。在初中时，兴趣主要是英文以及中外史地和自然科学知识声光化电之类，这与当时学校的条件有关。我上的是一个英国教会办的学校，所请的中文老师都不太高明，学生也不佩服。自然科学和中外史地方面的老师却都很不错。英文当然是好的，许多课本都是英国出版的，讲课也用英文。到了高中阶段，我主要花时间在课外阅读方面。当时天津有两家外文书店，我经常去买书，看了不少外文书，因此兴趣也就转到西方文学方面去了。同时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廉士聪爱写一些旧体诗，我因此向他学习，也写了不少古诗。英文诗也试译过一些，同时也摹仿写过几首。

中学毕业时，家里同意让我去英国读大学。我决定考牛津大学，读希腊拉丁文学（后来又读了半年中古法国文学和一年多英国文学）。因为原来没有学过希腊拉丁文，因此在伦敦先补习了一年多。在这期间又读了不少书，不限于外国文学方面，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民俗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对什么都有兴趣。也开始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回国以后，头几年是在内地教书，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外国的

新书不容易看到，因此读书就限于中国文学方面。后来在重庆到了一个国立编译馆作翻译工作。编译馆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收藏了不少过去人编集的各种丛书，这样又读了不少文史杂集、笔记小说之类。由于一些偶然的条件和朋友们的鼓励和启发，开始写了一些有关文史考据和古代中外史地方面的笔记。但也没有在一些方面坚持研究下去，做出比较扎实的成果。

建国后这三十多年间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翻译工作方面，尤其是外文翻译方面，变成了完完全全的翻译匠。由于周围条件的限制以及各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读书和补充各种文史知识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了。聊以自慰的是搞文字翻译的时间多了，在这方面也算做出了一定成绩，但自己同一些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比较，总觉得自己做出的贡献太少，未免惭愧。

以上就是个人过去在文史方面读书经过的一个粗浅轮廓。至于谈体会或者说经验教训，我想有一点可能对别人也是适用的，就是在学习方法上，重要的一条是首先要启发学习者对某方面知识的兴趣，并且主要靠自学。死背教条，死灌什么东西，增加许多上课时间，增加学习者的负担，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们教学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个学生被指定有一个或两个导师，每星期只约定时间谈个一、两小时，让导师了解一下这个星期读了哪些书，看看所写的短篇论文或笔记，指点一下，提供一些在所学方面需要读的书，此外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上午或下午愿意去听一些公开讲课也可以，不愿听课，去图书馆自己去读书也可以。一般读书都在晚上到深夜，或找些同学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我觉得这种启发式读书方法比坐在课堂里听许多课的死灌方法要好得多。其次就是博与专的问题，我认为开始读书，范围还是广泛一些为好。当然象我个人经历那样，因为开头缺乏有人指导，个人兴趣又太广泛，搞的方面太杂一些，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浪费了不少时间，涉猎了许多可以不读的东西，但是学习的道路总是要自己摸索得来的。兴趣开头广泛一点总比一开头就专门研究一个小的方面要好一些。另外一点就是，治学总要有的一点“锲而不舍”的坚持精神。我除了搞外文翻译略有一点成绩而外，在

学术研究方面，虽有所涉猎，但都是浅尝辄止，无论在古今文史、或中西交通等方面，都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专著。这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供后学者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但是读书兴趣广泛一些，总不是一件坏的事，开头涉猎群书，总不免要杂一些。问题在于要先博后专。也许有人会说，天下学问那么多，怎么能读尽所有的书？实际上，读书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只要对一门学问感到兴趣，就会钻进去，把问题弄懂。专门研究一行，觉得搞不清楚的时候，就要去看看其他方面的材料，天下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研究一个文学方面的问题，往往要查一下当时的历史资料，也许还要研究一下地理，也许还要点外文知识，也许还要研究一下古代和现代的天文历法、民间风俗习惯等等，有时甚至要一点自然科学常识。所以在治学上，广泛的知识总是必要的。个人深感学疏才浅，现在年纪又比较大了，精力不如从前，许多过去想做的事都没有搞成，实在也说不出有什么治学经验，拉拉杂杂，就写到这里吧。

能人遇明主则显

虞舜耕于历山之阳，立为天子，其遇尧也；传说负土而版筑，以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薪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其遇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为天子师，则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自槛车，以为“仲父”，则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伯牧牛，举为大夫，则遇秦穆公也。

《韩诗外传》

〔今译〕 虞舜本来在历山的南麓从事耕种，后来被立为天子，那是因为遇到了唐尧；传说肩背黄泥夯筑土墙，后来被任用为大夫，那是由于他碰上了武丁；伊尹原来是有莘国国君的僮仆，背着柴禾、挟着菜板，调和五味作羹烧菜，但后来却高居相位，那是他有幸遇到商汤的缘故；吕望这个人，五十岁时还在棘津叫卖酒食，七十岁时还在朝歌城帮人宰杀牲口，直到九十岁才成为天子之师，因为这时他遇到了周文王；管仲曾经被捆绑在囚车里，后来被尊为“仲父”，那是由于他碰上了齐桓公；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代价自卖其身，去给秦伯放牛，但不久竟被选拔为大夫，那是因为得到了秦穆公的赏识。（周冠明）

《玉台新咏》三问

金克木

中国古诗总集五部：《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其中《玉台新咏》地位最低，被认为“宫体诗”、“艳诗”的结集，和后来唐末韩偓的《花间集》、五代词集《香奁集》同类。古来传统这样看，现代也似没有改变。除了由于其中保全了《孔雀东南飞》一首长诗而被提到外，不受重视。本文不过是想实地考察一下，提出三个问题，附一点试探性解说。问题是：一、由来；二、性质；三、评价。

《玉台新咏》一书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想问：这书是怎么出来的？照传统说法，这是陈朝徐陵在梁朝时承梁简文帝萧纲的旨意编集的，主要是收萧纲一派的连萧纲自己也认为“时伤轻艳”的“宫体诗”。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萧纲和昭明太子萧统是兄弟。萧统是《文选》的主编。两人各编一本文学总集。一个署名，由《昭明文选》而传。一个不署名，实际编者徐陵活到了陈代，书脱离了梁代萧纲。两书所选诗重复的只六十九首，不到后一书的十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短促的梁朝及其前后几十年内并不仅出现了这两部由太子发动的总集，而且还有其他总结性的著作。现存的书如：锺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庾肩吾的《书品》、齐代谢赫的《古画品录》、陈代姚最的《续画品》、宋代刘义庆作而梁代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还有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佛藏最古的编集序目。他还编了《弘明集》，这是论文集，其中保存了范缜的《神灭论》。梁代慧皎的《高僧传》是现存同类书中最早的一部。宋代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最古的编目。现只存序目的梁代阮孝绪的《七录》是汉代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的重要的早期分类书

目。还有企图统一语音的著作，如失传的沈约《四声谱》等书，是隋代统一南北语音的《切韵》的一个来源。还有失传的梁代殷芸《小说》，若远溯可到晋代的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以至魏代曹丕的《典论·论文》等，可见渊源，但高峰在梁代。《隋书·经籍志》及其他书所引还要多。单算梁代，只有502年到557年共五十几年，为什么集中了这么多人作总结工作？内容从文学、艺术、宗教到语音，作者从文人到和尚、道士，体裁从选集、评价、记事到理论，方面很广。帝王提倡当然是重要条件，但不能如刘师培所说是文学兴旺的主要原因。

玉臺新詠卷下
古詩八首
李延年歌詩一首并序
蘇武詩一首
古學府詩六首
陳尚書左僕射李少卿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張衡同聲歌一首并序
宋子侯董嬌娘詩一首
枝乘雜詩九首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漢時童謡歌一首
蔡文姬悲憤詩一首并序
蔡文姬悲憤詩一首
徐幹詩一首
室思一首
情詩一首
古詩無名爲陳仲卿作情
古詩八首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妹
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繅故人工織素
織素日五織素五文餘將繅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獨宿長夜夜復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長夜思
既來不須更久又不處重閨諒無鵲鳳翼得凌風飛翔以適意引領送相歸

明赵均小宛堂复宋本《玉台新咏》

而且，为什么在王朝本身很不稳定，南方和北方分治的情况下，帝王有那么大兴趣提倡这些？这不能用帝王的个人心理和思想作解说，也不能把王朝的更迭作为文化的要因。六朝并无文化大变革，倒有武装冲突和杀戮。在那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官僚文人虽能连在几朝做官却也纱帽不稳随时会被杀，这些人为什么热心著这类书总结文学艺术历史？可见必有客观历史原因和动力，以致不得不如此，才能形成潮流。所以还得追究。既要追到深层，还得放大眼光，不仅看到帝王、文人，还要看到整个社会，看到南朝和北朝，西域和海上，还得上下追索历史的“上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总结性著作有开创性，水平很高，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有研究价值，例如《文心雕龙》等书。这就更不能归之于帝王提倡等简单政治原因和表面的一时社会风气了。这明显标志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神灭论》的公开辩论不是偶然出现的。从《晋书》、《南史》、

《北史》、《隋书》等唐代人所作的历史总结可见端倪。这个问题应当仔细研究，不能简单作答。这里不多说了。

《玉台新咏》是一部什么书？

其次，我想问：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帝王的旨意以及编者的奉命只能说明表层。徐陵的《序》和他自己的文风是应时酬世之作，不足尽凭。必须审查内容。开篇第一首“上山采蘼芜”就不能说是“轻艳”之作。照现在说法应当作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一首古诗，事实上确实历来传诵不衰。收了萧纲等贵族的诗是“钦定”著作都有的情况。要点是书中还收了不少出了那个所谓“宫体”的格子的诗。宋刻本所收少了一百多首，性质没有变。即使唐代有所修订，底本仍必出于梁、陈。徐陵承萧纲意旨编这“轻艳”诗集的传说是唐朝刘肃在《大唐新语》里记的。唐元和年间上距梁代约三百年，若情况属实也只能定其缘起，还不能定其性质。而且书是陈代出来的，徐陵本传不载，《隋书·经籍志》才著录。这书和《文选》不同，尚未经皇帝或太子署名“钦定”。所以还得查查这部诗集本身，除了承萧纲旨意和《文选》对立（萧统的诗几乎未选）并收进当时贵族和官僚的流行诗以外，究竟还有什么用意，什么特点？

清朝朱彝尊有《书玉台新咏后》，认为文选楼中诸学士改窜古诗，“徐陵少仕于梁，为昭明诸臣后进，不敢明言其非，乃别著一书，列枚乘姓名，还之作者，殆有微意焉”。他说：“昭明优礼儒臣，容其作伪”。他是以考据家口气为五言古诗始自枚乘而说，对此书用意作推测之词，并非考证。但是他指出这书和《文选》对立并有“微意”却是有所见的。是不是萧纲要宣扬自己的诗体因而另选一集诗，不象《文选》那样诗文并收呢？可能徐陵由此才能编著此书，收《文选》所不收；但是否尚别有“微意”？

清朝齐召南参与校刊此书，附有按语，指出第一、二卷“词皆古意”，第三卷“艳体犹与古调相间”，第四卷中“小谢（谢朓）已为宫体滥觞”，第五卷“艳体已成”。程刊吴注本卷八末按语说：“三、四卷是宫体间见。五、六卷是宫体渐成。七卷是君倡宫体于上，诸王同声。此

卷是臣仿宫体于下，妇人同调。”卷九末按语说：“卷九、卷十是补遗，然多古趣。又：此卷是七言，凡拟古歌行格调半由此起。”卷十末按语说：“此卷是古之五言绝句。”又注出宋刻本原有六百九十首，今增宋刻不收者一百七十九首，共八百六十九首。这些按语说明原书体例，符合内容。

由此可见，此书虽然以帝王贵族的当代诗体为重心，以妇女为主题而定选诗范围，但和《文选》中的诗的部分不是仅仅由此划界，而是自有特点，在文学观上前进了一步。《文选》诗文并选而以类分，但分类及排列并不明示系统、程序。分类由“补亡、述德”起，至“军戎、郊庙”止，中间只是大体上由公而私排列，头尾不伦不类，似乎以补《诗经》为首，以“雅、颂”体为结。以下又分“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将不收入前面的诗分类另列。所选的诗分类或依内容，或依形式，可见对诗尚无一定见解。《玉台新咏》却在预定的内容主题范围之内选诗，由“古诗”、乐府诗起，大体照时代排。卷三到东晋，卷四至卷六已到梁朝，卷七才专选梁武帝萧衍等帝王的诗，卷八选梁朝诸臣的诗。卷九是七言诗，兼收四言、六言、杂言。卷十是五言绝句。仍大体照时代先后排列。很明显这是有文学史和文体史眼光的排列顺序。《文选》各类之中虽以时代先后为序，但分类琐碎，不见文体之变。这书就明白显示文体变化，最后分溯七言、五言诗形式历程，已经看得出向唐代诗体过渡的苗头了。全书排出了由乐府到宫体以及七言、杂言古诗、五言绝句的发展路线。这不是仅仅因为只收一种内容的诗照时代排列而自然显现的，那样就不必依照形式另列七言、五言附后了。可见编者徐陵虽承帝王意旨，顺时代风气，却是在可能范围内发抒了自己的文学史观的。他编选的的诗的程序系统显出了诗的发展路线：乐府诗——拟乐府诗——古体诗——今体诗（宫体诗）——杂言、七言诗（歌谣）——五言绝句（歌谣）。

值得注意的还不仅这一点。在主题上编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全书范围虽是以妇女为主题，所选诗的内容主题却不是一种。全书提供了文体、文学思想以至文化的系统排列资料。这是历史发展的本来系统，但如果编者毫无见地，就不会这样收录。他本来可以将宫体立为

标准，选辑同类诗篇，那就看不出更多的意义了。由此追溯思想，可以推论，最初编者若确是徐陵，他为了做官，依顺帝王所倡风气以靡靡之音受讥于后世，但这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思想。古代文人言行与思想往往分歧，诗文著作也不都是己意。明清学者文人都作过八股文和应酬文，其中并不见作者真面目。尤其是诗，有种种情况。下面对这部古诗总集再试略作一点分析。

妇女地位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指示器。妇女是婚姻和传代的核心。从氏族社会以族为单位起，到了今天，世界各国还在闹各种各样的家庭婚姻问题。一个社会中各群体以至各个人(包括女性自己)对待妇女的态度是上达意识形态，下及经济基础的，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内容。《玉台新咏》正好是在这一点上集中了我国约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止的诗中的妇女表现，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不过我们一定要注意，我国古代诗中的表现一定要结合作者和读者以及“上下文”理解，不能只看作品的表层意义，同时还要注意古诗有群体性质。这是诗和一般史料不同的地方。我国现代早已有不止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但只注意了妇女作者和作品。

妇女在旧社会中，除原始氏族社会中情况有所不同外，从来没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和独立的人格。这种不平等当然不限于妇女，也是全社会的情况，因为自由平等和独立个人人格的观念体系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完整出现的。不过妇女作为整体又和男子不同，可说是一种特殊的人或半奴隶。若分别考察，不妨大体分出三种对待妇女的态度：一是当作人形的物，即生产工具、商品、玩物之类。二是当作人，但只是家庭中的人，是附属品。在家中有的婆母或“悍妻”可成为家主，若在帝王家还能左右政治，但仍附属于家庭单位，是后妃。武则天称帝仍由李家王室而来。明初唐赛儿象是例外，所以被诬为“妖妇”。她自称“佛母”，仍不离家庭。三是作为一般的人，在个人对个人或男对女的个人之间可以是平等相待的人。这三种态度在《玉台新咏》中表现得都很清楚，正好和以后许多小说、戏曲对照。

例如“上山采蘼芜”一首中：“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这是将妇女作为生产工具，以生产效率作评价标

准。“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不过是换个工具。“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是只论经济效益。

又如“天上何所有”一首中：“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这是家庭中妇女，比物稍胜，是人，但仍是工具性的。妇女是家庭和男子的附属品，所以“翩翩堂上燕”一首中，主妇为客人缝补，就要“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隅”。客人连忙自解：“语卿且勿眊，水清石自见。”

至于一再套用的“罗敷”、“秋胡”等诗中，妇女虽属于丈夫，却已有对外人能抗拒的独立人格表现，而且要求男子平等，和自己同样。“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和“团扇”诗中“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箠笥中，恩情中道绝”不一样，不是自认为工具和附属品了。

秦嘉、徐淑夫妇的赠答诗是夫妇平等的爱情，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那样仍然当作造成灾祸的玩物截然不同了，有了个人的“人情味”了，当然还在不伤社会的圈子内。

类似的是无数的“相思”诗，举不胜举。有各种各样的别离和相思。“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繁钦的《定情诗》竟是写妇女主动寻求爱情而失败。“自伤失所欲，泪下如连丝。”这在古时是不合正轨的。这些诗现只就表层说，深层寓意暂不论。下面再考察全书各卷。

第一卷中的古诗展现了古时对待妇女的态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不能说是“轻艳”。“艳歌行”是指罗敷故事之类。

第二卷开头是挂名曹丕而大概是徐干的《于清河见艤船士新婚与妻别》，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作结，仍是夫妇个人平等的诗。甄皇后、刘勋妻的诗是弃妇的怨诗，是班婕妤“团扇”诗的发展。从曹植起，个人代言体的诗大量出现了。“弃妇”和“相思”成为套子。阮籍的《咏怀》中选了兩首情诗。“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愿为双飞鸟，比翼不相忘。”而寓意却在“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潘岳的《悼亡》诗久有评价，更不必说。石崇的《王昭君辞》中，“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可见他的被杀未必是仅由争夺歌姬绿珠之故。从这里已可看出文人诗在旧套子中加入自己寓意，

开始了新的传统，在“拟古”的名义下创新。“情诗”并非全是男女之情。

第三卷到第六卷，从陆机的《拟古》起，又有一种“句仿，字仿，如临帖然”的只有新词并无新意的传统。陆机、陆云兄弟一再《为顾彦先赠妇》，这也是“代言”，和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是一类。这些诗在修辞艺术形式上前进了，但为什么不创新格式呢？仅仅是追求词句吗？鲍照的妹妹鲍令暉的《古意赠今人》中说：“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见。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她的《拟古》中又说：“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这些诗中有的也是别有寄托吧？咏物诗增多了，不仅是追求词句，也仍有“团扇”古意。如谢朓的“玉颜徒自见，常畏君情歇。”“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他还有《咏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诗。文人诗越来越缺乏新意而且眼界心胸越来越小了。可是作者转而突出了自己个人，想到自己应当是一个独立而非附属的活人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新的社会意义吧？诗能怨，是不是表现不甘心于自己处境呢？吴均的《拟陌上桑》说的是：“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不是旧日罗敷了。他在“和萧子显”的《古意》中说：“非独泪成珠，亦见珠成血。”“谁堪久见此？含恨不相看。”王僧孺也有：“可怜独立树，枝轻根易折。”“弦断犹可续，心去最难留。”徐悱夫妇赠答诗也是平等相待。梁代诗中值得注意的是“同”、“和”的诗多了。第七、第八卷中“应令”、“应教”之类“赋得”以奉承帝王贵族的诗多了。这当然是大多言不由衷难有新意的应酬诗。若当初为提倡“宫体”而编，这两卷应在开始，现在却在末尾。看来是本来照历史顺序编排，不是陈代的改动，因为称号混乱不似经过改动的定本。第九、十卷依诗体编，程序仍同以前，等于另成两编，合共三编。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些以妇女为主题的诗的两重性。表层是妇女，深层是文人，因为两者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处境和心情类似。正如王僧孺的诗句：“逐臣与弃妾，零落心可知。”这就说明了弃妇和相思、罗敷和秋胡何以为当时文人不厌重复地吟咏。这并不只是趋时、陈套。这种诗应分做两类：一是形式的，是“时文”。一是真实的。其中真正是妇女所作或为妇女而作的并不很多，而假托以抒文人之怀的反而不少。明显的最古例子，不算《离骚》，是张衡的《四愁诗》。他自己作序说

明用意是政治，并引“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为证。以后又陆续有人拟作。从表层看是一般相思，从深层看是不仅男女而且君臣。这是从解说《诗经》以来至近代不变的、人所共知的老传统。弃妇诗更是如此。“新人不如故。”“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欢。”“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以后，大量的这类怨诗涌现出来。这已不是孔子所说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怨”的本义了吧？这是由当时文人的处境而来的。陆机显贵一时，转眼被杀。读《南史》（不仅《文学传》）即可看出当时文人实际遭遇。龚自珍读《南史》所作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然是既说南朝又说清朝。谢灵运写山水诗仿佛清高，但他的游山玩水是“从者数百人”，砍伐森林开路，乡下人“以为山贼”的。他终于被杀。司马迁已经叹息文史之官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文人依附于帝王、贵族、大官僚。不幸的是这些人中有的掌权者附庸风雅，自己又会作诗，是内行，瞒不过。“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由此可知“文章气运”。汉代乐府歌辞的作者和接受者都是群体。建安时起才有了个人人格，诗中有了“风骨”。但文人仍同妇女一样并无真正独立人格，缺少平等地位，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诗上承乐府，仍隐个人。总计有两类诗：一是为应时而作的，一是为特定的知音而作的。后一类中常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张衡在汉尚有《序》明言，阮籍在晋就只能以隐语《咏怀》了。这种情况直到初唐才改变，作诗可以不用陈套了，文人可以相对地独立了。陈子昂可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必假借了。到杜甫时，尽管他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但还是能说，“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在六朝是不行的。那时颜之推、庾信南人在北也不能如意。文人还不能象杜甫那样自夸：“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南朝帝王不过如同高级大地主，直接掌握人民生活实权的仍是地方豪强家族，互相厮杀的主要也是他们。这个网罗是出不去的，不比后来。由“侨寓”而“土断”而“九品中正”，文人只能自己吹嘘，处境实同妇女，随人俯仰，受人摆布。因此王朝夭折实际不影响社会结构，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也”，换了人，换了族

姓而已。然而唐代文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也过不了多久。李商隐只能给人当秘书，只好作《无题》诗。从五代十国起，全中国分为几个互不相下的政权，没有一个能如汉、唐那样独尊于其他政权（包括西北、西南）之上的。直到元代才情况大变。文人随“时运”推移。社会结构大致未变时，诗的两类和双层次情况也不会大变。文人都自己知道并能互相分别“酬世”的“时文”和“传世”的著作，并且能不言而喻诗为谁作；表层、深层，彼此“心照不宣”。读汉以后古代诗若不了解古时文人的处境和心情是很难体会他们作诗的用意和作用的。

如何评价《玉台新咏》所收的诗？

第三个问题是：对《玉台新咏》所收古诗如何评价？古今中外价值观念体系随时、地、社会、阶级、阶层、群体而不同，不先定用什么价值尺度便难下结论。不过总是要先实事求是考察对象。《玉台新咏》是只收一个主题范围的诗，但并不是只收所谓“宫体”的“轻艳”的诗。这部书覆盖面狭窄，不及《文选》所收之广，但初步具有文学史的眼光，并不是只作简单分类。它不仅显示了从汉末到梁代的诗体变化，而且反映了妇女和文人的生活 and 心情。其中帝王、贵族、大臣的两卷诗中有一些以妇女为玩物的低级作品。真正恶劣不足道的只有萧纲的一首或加其他几首。萧衍是佛教徒，又著讲儒家经义的书，是皇帝，政治人物，所选他的诗符合当时风气，并不特别恶劣。这书不是只表现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思想，反而包含为妇女申述怨恨的思想。这正是当时不少文人的心情。他们不只是为妇女主持公道，也是同病相怜，借题发挥，含有独立人格的觉醒。我们需要考核这些实际情况才能决定评价，只有标尺还不够。不过现在总不应该还把“相思”当作丑事，对古代的夫妇谈情、殉情和文人的牢骚、怨恨加以批判了吧？至于将《玉台新咏》中的妇女及文人和更早的《诗经》及更晚的词、曲、弹词中的相比较，也会是有益的研究吧？若与国外的同类书相比，以我浅陋所知，古印度的才真是“艳情诗”，虽也有“思妇怀人”，却决非《玉台新咏》之比。古印度人和现代人（印度的和其他国的）反而以此为高尚并有别解，和我们的看法大不相同。诗有两重性，中国以男女喻君臣，印度以男女喻神人，是不是其实一回事？这更不能简单下结论了。

试论中国古代的隐士

——刘叶秋——

“隐”为“蔽”义，指潜藏不露。隐士即潜居避世之人，或处山林，或在草野，或寓朝市，俱以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为其特征。隐居、隐士这两个词，先秦古籍已多见之，其中的一些解释，和后来隐士的动止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云：“隐居求志，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乃是“养志”待时；遇到能施展抱负，以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又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皆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楚辞·七谏·沈江》：“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不见用即将隐藏，虽未必真的身入岩穴，却显示了对不肯苟合取容的态度。

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yuè)、吕尚(姜子牙、太公望)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传说傅说曾为胥靡(服劳役的刑徒)，筑于傅岩之野，武丁欲复兴殷朝，访求得说，举以为相，而国家大治（《史记·殷本纪》）。